

第一章

中国政府 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政府面临的最重要也最紧迫的经济问题之一是如何有效地解决经济的“相对过剩”问题。它的确是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从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来看，反经济的“相对过剩”取决于扩大国内需求，而扩大国内需求最有潜力的是扩大住宅消费，特别是通过对传统住宅分配体制的改革推动一轮新的消费增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与此相匹配的是，信贷政策要做重大调整，即改变原来的只重视生产信贷而不重视消费信贷的信贷政策倾向，通过政策的引导，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正在成为支持下一步经济适度高速增长的基础。因此，住房体制改革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给国内市场带来新的活力。

1.1 政府面临的新问题： 生产“相对过剩”

生产过剩，真的是“狼来了”吗

今天的中国正在迎来一个“相对过剩”的时代。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都感到较为迷惘，因为我们昨天仍生活在产品短缺之中，对“过剩”反而感到陌生。一下子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什么好像都多了，价格在持续下跌，生产的产品在不断地积压、积压。大量地积压，占用了大量的流动资金，使许多厂家生产经营难以循环，三角债在大量增加。

生产过剩是一种必须的过程吗？还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呢？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现实：在我国 20 年的经济发展中，粮食出现了多次周期性的过剩，如 1984 年粮食大丰收后出现的“卖粮难”，近两年又再次出现这一现象，政府已深知“谷贱伤民”

的严重后果，已在努力采取措施避免农产品的周期性过剩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对农民造成的损失。生产过剩问题近年来也一直困扰着纺织业的生存和发展。可能许多人对 1983 年废除了施行了 19 年的凭布票定量供应纺织品的制度感到异常兴奋，它标志着“穿”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更引人自豪的是 1989 年，中国棉纺生产能力居世界首位，毛纺能力居世界第二位，化纤生产能力居世界第四，成衣率跃居世界第五位。随之，一些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仅 1 年后，全国棉纺锭就跃过了 4 000 万大关，大大超过了市场的容量。1991 年开始不得不进入艰难的调整期，国务院要求压缩 1 000 万棉纺锭。实际上 5 年压了 465 万锭，而 1994 年市场稍有松动，又新增了 444 万锭，结果压缩 1 000 万棉纺锭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反而有所增加。

生产过剩“猛于虎”。扩大市场容量的速度已递减，而生产能力却还在增加，并最终导致了纺织工业效益的全面滑坡，亏损面扩大。1996 年国有纺织工业企业亏损面达 42%，净亏损额高达 106 亿元，全国大多数地区国有纺织工业都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国有大中型纺织亏损企业数占全国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数的 18%，亏损额占 19%，涉及职工人数 180 万人（占 20%），均居各行业第一位。由于纺织品的消费弹性较低，继续扩大国内、国际市场都十分不容易，因而惟一的选择就是“减员压锭增效”，即人为地削减生产能力，促使结构转换、升级；否则，仍保持如此大的生产能力，纺织品恶性竞争就会加剧，企业效益就会进一步下降，更重要的是纺织产业的过度扩容会占用更多的生产资金，减少其他有发展前景的行业的资金需求，同时也不利于纺织企业本身的

技术创新及长远发展。

我国聚酯工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相对过剩”就像恶魔一样缠绕着我们。《经济日报》头版上刊登了一篇《聚酯工业怎么了》的文章，文章说，三年时间，聚酯价格由每吨 2 万元猛降到 8 000 元。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在 70 年代，我国先后引进建成了上海金山、天津石化、辽化三大化纤企业，聚酯生产从无到有，达到 30 多万吨；80 年代，仪征化纤、金山二期相继投产，聚酯生产能力又有较大增长；“八五”期间，我国建成一批年生产能力 6 万吨左右的中型聚酯项目，新增能力 47 万吨，1996 年又有四个聚酯项目投产，加上这些年各地自己上的一批年产 1 万吨左右的聚酯项目，到 1995 年，我国聚酯生产能力已达到 190 万吨，年产量达 174 万吨，居世界第四位。生产能力上去了，参与竞争的企业多了，价格自然会有所下降。另外，1996 年以来，我国纺织工业出口不畅，效益下降，购买原料的能力不足，对聚酯的需求自然也有所下降。当然还有来自于外部的原因，韩、日、印尼等国的产品也大大地挤占了我国的国际市场份额。

VCD 市场也一样，从 1997 年开始“VCD 大战”比任何真正的战争都激烈，广告上到处是 VCD 的身影，中央台的“标王”被爱多 VCD 夺得，第一次取代了酒类。“VCD 价格大战”令许多新老 VCD 生产厂家不寒而栗，消费者也看花了眼。生产过剩环境中的竞争就是如此残酷，降价“没商量。”

从“短缺”到“过剩”，经济制度的巨变

生产的相对过剩是与技术进步的加快相联系的，在我国，生产的相对过剩还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相联系。它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是竞争和效率的提高的一种反映，也标志了社会的进步。当人们以“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经济活动，并且在政府的限制逐渐减少的条件下，就会出现阶段性的生产过剩，甚至会出现一段较长时间的经济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与生产短缺是会经常出现的，其矛盾的表现就是经济周期，出现前者就是经济相对萧条，出现后者是经济相对处于高潮，彼此起伏，循环往复，这就是基本的经济规律或运动轨迹。

前些年经常听到人们抱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这一经济学术语，在中国现已家喻户晓。我们都知道通货膨胀在中国很大部分是由于“短缺”造成的，反“通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反“短缺”。1988年的抢购风潮，就是人们对“短缺”的恐慌。几十年来，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于在“短缺”的环境中生活，生产者是“爷们”，是“上帝”，没有消费者的权力，他们生产什么你们就得买什么，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产品和价格都“没商量”。由于这种“短缺”是制度内生的，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一种“短缺病”，因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被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称之为“短缺经济”。

“短缺”是计划经济国家的常态，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得到了体现，像“幽灵”一样在人们的生活中徘徊：

排长队，买米，在雨中淋、风中摇，还要遭人白眼……

东托关系，西托关系，为的是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否则，可能挨“票贩子”宰……

凭布票、凭粮票，衣食住行，哪一样不是紧紧张张的……

如今又是另一番情形。什么都过剩。现在急的、喊的不是消费者，而是那些曾经是“爷们”的生产企业、商家。你说怪不怪。这与其说是消费者的胜利，还不如说是改革的胜利和市场经济的胜利，市场竞争和市场化改革使社会物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加快技术进步，拼命扩大生产规模，尽可能地增加产量、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一个个“短线产品”都逐渐变成了“长线产品”。因为只要是根据市场需求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及企业的效益，产品短缺就意味着其市场价格会上升，就存在高额利润，特别是一些基本生活必需品（衣食）的短缺程度越高，需求会越旺，价格便会大幅攀升，厂家和商家的利润就越大，从而激发厂家大量生产这类产品，而且新的厂家不断地加入。谁先知先觉，最早地开发产品，扩大生产规模，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利益激励机制”会使市场中所有的短缺产品变为丰富产品。

国家贸易部对 613 种主要商品供求排队表明，1997 年下半年供不应求商品只有 10 种，占 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 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 31.8%。供给过剩主要是工业品，在 447 种主要工业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 297 种，占 66.4%，供过于求的商品 150 种，占 33.6%；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除高科技产品外，我国很多的工业品产量处

于世界前列。这种情况还在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1998年一季我国首次出现了无任何供不应求商品的局面。而供过于求的商品占 25.8%，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 74.2%，其中供过于求的工业品占 31.5%，比上年明显提高。第三次工业普查表明，全国 900 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 60%，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经高出市场需求 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 60%，空调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 43.4%，电子产品供大于求的产品达 75%。经济相对过剩不仅体现在生产上，国内资金、外汇等也出现了相对过剩。随着储蓄率上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经济运行出现了大量的资金剩余：银行内部出现大量的“存差”。1991~1996 年出现了 11 100 亿元的存差，1997 年 1~10 月份尽管降息引致存款下滑，但存差仍达 2 540 亿元。而从改革之初到 1991 年这段时间内，银行体系内各年均均为“贷差”。还出现了大量外汇剩余。我国外汇储备 80 年代末不足 100 亿美元，1997 年末达 1 400 亿美元，且还在不断增加。

生产相对过剩也是导致当前“宏观喜微观忧”的重要原因，与近几年工业增长速度惯性下滑、效益滑坡息息相关。1998 年第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仅为 8.2%，比正常水平低 3~4 个百分点，为“八五”以来的最低点，其中国有和集体工业增加值分别仅增长 1.9% 和 8.8%。企业效益大幅滑坡，微观经济矛盾加剧。前两个月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仅 16.2 亿元，比 1997 年同期下降 82.8%，企业亏损面为 32%，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高达 355.8 亿元，增长 21.7%。国有企业再度出现净亏损，净

亏损额达 76.1 亿元，比 1997 年同期增长了 3.6 倍；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首次出现了净亏损，净亏损额达 15.7 亿元。主要原因是：(1) 工业品的市场需求不足或工业品生产过剩进一步加剧，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从而降低利润率。特别是一季度能源产量的大幅下降（-9.3%），发电量的低速增长（1.8%）和货运量的持续下降（一季度下降 6.8%），表明不少企业开工不足，生产过剩，微观经济处于不够景气的状况。(2) 企业创造需求的能力不足，消费者在购物时经常感到产品不合意、服务上存在很大问题，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与消费者的需求存在很大差距，这些差距实际就是巨大的潜在需求，而国内企业由于体制不顺、对“买方市场”环境严重不适应，造成企业创造需求的能力很低。

与工业增长大幅下降、效益滑坡的同时，下岗职工明显增多。大量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成为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许多难解问题，都是与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或市场需求不足有关。就当前我国的现实而言，如果不解决好生产的相对过剩问题，类似于西方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生，甚至可能发生“大萧条”或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大灾难，我们需要预防和谨慎对待。

“过剩”是相对的 潜在的需求巨大

对我国现阶段来讲，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需求的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很大。这一点有别于发达国家的有效需求不足。目前的生产过剩可以认为是一种体制性及结构性的生产过剩。一方面，由于一些体制性的原因，阻碍了新的消费热

点的形成，从而使生产能力出现了暂时的过剩，如福利分房制度阻碍了房地产市场的扩大，而汽车消费的政策限制抑制了汽车消费的增长。同时，由于企业制度的落后使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很低，许多产品在其设计、包装、实用性上存在缺陷。另一方面，长期结构调整的滞后，过多的重复建设，造成了无效生产能力规模过大。国有企业“只能生不能死”，没有效率也要维持，使许多存量资产不能淘汰，也不能转移，既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又造成了技术的落后、企业效益的滑坡。一些技术改造项目往往仅对已陈旧的设备进行小修小补，结果反而是延长了该淘汰的设备的寿命，保护了落后，增加了结构调整的难度。因此，目前的生产过剩或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结构调整不到位和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只要我们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深化改革、制定刺激需求增长的政策，就能克服经济过剩、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

1.2 各显神通， 与相对过剩作斗争

我们在 1998 年初的题为《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当经济环境由“短缺”转向“相对过剩”后，扩大需求而不是抑制需求成为经济政策的重点，此时财政政策应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而以前我们过多地依赖金融政策的微调。在“短缺”的经济环境中，经济的下降往往是抑制需求造成的，松动银根就能把抑制的需求重新释放

出来，经济增长则相应回升。然而，在经济“相对过剩”的环境下，仅松动银根，不主动地去刺激需求，经济增长将难以启动。面对相对过剩的状况，不同的人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

农民的无奈选择：把过剩过廉的辣椒倒入河里

南方某地，1997年辣椒产量大丰收，由于当地市场供给永大于需求，而运到外地销售，运输费用又太高，致使辣椒价格大幅下降，每斤仅1~2分钱，卖一担辣椒还不够功夫钱，有些农民气愤之下，将辣椒扔进大河。还有南方某柑橘产地，产量的大丰收给农民带来的不是喜，而是忧。当地无法销售，他们自发地组织到北京等大城市销售，但一路上面对层层关卡，“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到城里占一席之地，卖出了他们的产品，但算一下账，原来他们根本没有赚钱，白忙乎了一阵，也许来年有了经验会赚钱，有关新闻报道对“这一农民进城大行动”给予了肯定，认为农民已开始有了市场意识，即使农民是被动地走近市场，也是值得惊呼的。但有一些农民却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即任柑橘挂在树梢上，不采摘，因为卖出的价钱不如采摘用的工钱。

政府出新招：“减员压锭增效”

就纺织业来讲，不是中国第一次才碰到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最早在纺织业上用蒸汽机代替手工作坊而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从此开始了世界的“工业革命”，但它不久遇到了纺织品大量生产过剩的问题。最初的策略是利用军事手段强行占领国外市场，这种办法被

证明并不成功，其后基本是听任市场竞争来逐渐淘汰，经历一百多年的漫长时间，从 3 000 多万锭压缩到 27 万锭，这一依靠市场的过程周期过长，代价太大。而日本政府吸收英国的教训，采取了政府援助的方式参与纺织工业结构调整，对过剩设备实行收购压锭的政策，并对调整中的失业者提供补助和就业培训支持，共花费 4 000 亿日元，用 10 多年时间完成了纺织工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日本政府的部门调整政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行萧条和设备调整卡特尔，二是收购报废制，三是设备注册制。萧条和调整卡特尔主要是通过指导行为对棉纺大公司通过自我约束，共同降低开工率，共同淘汰一定比例的设备。这是在 50 年代初就开始实行的一种形式。70 年代末以后，大公司一般自行压缩生产能力就己不再享受政府特殊的资助了。收购报废“过剩设备”，是指由政府出资收购并废弃细纱机和织布机等纺织设备。政府通过与产业界合作，对供求进行预测，推算出过剩设备数量，由政府出资收购报废。1956~1963 年，共废弃了 4.9 万台织机，每台织机的补助为 2 万日元，其余费用由产业界自身负担。1964 年，采用了废弃两台旧设备方可添置一台新设备的“废旧更新”原则，同时允许开发银行发放贷款和实行特别折旧。到 1981 年止，日本政府设备收购报废累计花费 3 800 亿日元，其中政府补助金 524 亿日元，共废弃了 35 万多织机和 500 万锭细纱机。废除的设备数量，相当于 1966 年拥有的织机、细纱机数量的 $\frac{1}{3}$ 和 $\frac{2}{5}$ 。设备注册制，对已注册的现有设备，限制生产品种，并限制未经注册设备的使用，从而限制新增生产能力。设备注册制自 50 年代开始在织纱业和织布业中实施，

实际上是一种行业准入的限制措施。

日本政府在解决纺织业过剩时还采取了部门援助政策。早在 1978 年之前，日本政府就对纤维工业实施了调整援助政策。具体的做法是：（1）对纤维工业实施的调整援助政策的重点，不是促进转产，而是通过援助谋求企业再生，主要向这些领域的企业合并和设备现代化提供了优惠贷款。（2）明确规定设备的报废量和时间，同时对该设备报废而产生的借款提供信用担保。（3）政府建立萧条基金来支付由于设备报废而产生的退职者的退职金并延长支付失业者的失业保险和对企业主的工资补贴。政府发给失业者特定求职手册，并以公共职工安定所为窗口，实行就业介绍、职业培训、就业指导等一般性就业政策。

当然，在整个调整援助政策中，日本政府部门对于扶植高效率的企业集团起到了积极作用。有专门的部门，接受各都道府县的指导审查，由各地制定废弃陈旧设备和添置自动化、现代化设备的计划，根据企业的申请和能力，分配给企业具体实施。另外还采取了产业界的调整政策。主要指：设备现代化和技术革新；更新产品；加强垂直联系、企业合并及业务协作；开展对外投资及其他国际分工；转产及停业。即“两级化”策略。分三类实施结构调整：必须在国内生产的；可移往海外生产的；伴随技术转移而将阶段性移往海外生产的。

鉴于国外经验，我国纺织业解困的办法就是在政府有效干预下“压锭、减员、增效”。

从去年开始，国家先后确定了 6 项政策，来支持纺织业改革：第一，为搞好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工作，每压 1 万锭

给予 300 万元财政补贴，提供贴息贷款 200 万元，补贴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各承担一半，贴息由地方财政承担。第二，1998 年国家核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将重点向纺织业倾斜，并要求各地安排当年计划时，纺织业的呆坏账核销规模应不低于上一年的水平。1998 年中央新增的 100 亿元规模（增到 400 亿元），主要用于解决棉纺企业的压锭重组项目。第三，下岗职工将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保证下岗人员的基本生活费和养老、医疗保险的支付。第四，中央还将支持和扩大纺织品出口，国家将把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由 9% 提高到 17%，将输往欧美纺织品配额总量的 15% 以上直接分配给纺织自营出口企业。第五，棉纺细纱机的国内供货严格实行“生产许可证”和“准购证”制度，严格控制新增棉纺加工能力，同时鼓励细纱机出口，实行出口信贷和全额免税。第六，国家还将改进棉花供应办法，允许价格浮动 6%，并对用新疆棉顶替进口棉生产的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

“减法”“加法”一起上

所谓“减法”就是上面讲的“减员压锭增效”；所谓“加法”就是扩大需求，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的许多产业都存在重复建设问题，在某些利润已接近平均利润水平的行业规模还在扩大，大量的低水平重复投资仍在继续，这便是经济过剩的根源，并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除了采取“减法”解决已存在的能力过剩问题外，长期的、也是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根据市场潜在需求的变化，创造出新的消费热点。某些潜在的巨大消费热点正是产生高利润的区域，企业家，特别是有进取心的真正企业

家应把眼光瞄准这些潜在“区域”，挖掘增长潜力，创造社会财富。由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及创造高利润增长点需要有企业家和政府的冒险精神，而我国目前最短缺的就是“真正的企业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巨大的潜在需求（产生高利润的区域）却没有多少人肯花气力将它变成现实的需求。创造需求体现了企业家的才能和创造力，创造需求需要人的敏锐的判断力、决断力和冒险精神，而在长期的“供不应求”的环境中成长的中国企业领导人（大多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在这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及能力不足。

我们在 1997 年一份名为《我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竞争失利的原因分析——兼论国内企业反败为胜的战略和对策》的报告中指出：对改革与开放导致的中国市场环境变化，中外企业的感受完全不同。对于从长期习惯的卖方市场和受保护的分割市场中刚刚走出来的中国企业来说，对 90 年代的新市场环境十分陌生和不适应，感觉到市场空间非常狭窄，常常留恋过去的市场环境。而对于从发达国家以过剩为主要特征的买方市场中来到中国的外国企业来说，在中国目前供求平衡的市场上如鱼得水，感觉到市场空间广阔，市场潜力巨大。中外企业对当前市场环境快速变化的适应程度存在巨大差距，这是我国市场绝对规模不断扩大而国内企业市场相对份额不断缩小的主要原因。

生产相对过剩时代呼唤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呼唤能适应生产过剩的环境、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真正企业家。新一代企业家已经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为我们的企业培育出在“相对过剩”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发展自己、战胜对手。

1.3 刺激住房消费： 扩大内需的有效“通道”

未来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内需的扩大

我们知道 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 其增长的支持力是不同的。就大的方面来讲，改革之初到 90 年代中期，支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国内长期抑制的“温饱需求”，它具有“趋同性”的特点，也称为“排浪式”的消费浪潮。到了 90 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市场环境已从“短缺”变成了“相对过剩”，同时国际贸易的增长也有所放慢，外需的动力下降。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将依赖于内需。

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内需的扩大是由于以下原因。首先，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买方市场”的形成，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消费而不是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内需的扩大有很好的基础，特别是购买力增长非常迅速，这可以从高储蓄率和储蓄增量的继续增加上来确认，每年储蓄增量达 1 万亿左右。另一方面，经验表明，经济步入“小康”阶段，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会大幅增长，特别是“住、行”开始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大量消费高档耐用消费品（如汽车、住房），标志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即西方所讲的“消费革命”），大型商场和超级市场在我国大城市的大

量涌现也体现了“大众消费时代”已经临近。

其次，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内需是由“大国经济”的特点所决定的。所有的大国，外向型经济一般都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初期，其主要是通过扩展国外市场和大量进口国外先进技术而达到提高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的目的，但到了中后期，由于其增长规模的庞大及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则更多地依赖于内需的扩大。这一点，日本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我国也不例外。

三是国际竞争的加剧和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要求我们把眼光从盯着出口转向盯住国内市场。最近几年，由于我们的竞争战略存在一些问题，以及国内企业的体制性的障碍，国内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不高，在一些行业，国内市场“大片沦陷”。教训是深刻的，国际竞争不一定非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在我们自己的家门口国际竞争同样在进行，并越来越趋于“白热化”。保不住国内市场何谈占领别国市场。同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需求的增长难免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即扩大出口的潜力有限。因此，我们应该抓住时机，扩大内需，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实力。

“住”与“行”，最大的潜在需求

据测算，目前我国城镇消费需求收入弹性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交通通讯（1.31）、居住（1.16）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1.13）；而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弹性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交通通讯（1.67）、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1.45）、居住（1.37）。“住”与“行”将成为城乡居民共同追逐的消费热点。“住”的消费升级主要是指人们对居住面积、住宅装修